

# 「抒情」的時代性——陳世驥與楊牧

時間：112年12月15日(五)10:00-12:00

地點：佛光大學雲起樓

主講人：鄭毓瑜(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主持人：蕭麗華(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教授)

與談人：須文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記錄：國立中正大學人文沙龍團隊

## 一、從 16 封書信出發：陳世驥與楊牧的交接往來

兼具詩人、散文家、評論家、翻譯家及學者身分的楊牧先生(1940-2020，本名王靖獻，早年以「葉珊」為筆名，1972年後更改為「楊牧」)辭世後，其妻子隔年於西雅圖家中整理楊牧書信手稿，發現其中保留陳世驥先生(1912-1971)的16封來信。陳世驥祖籍河北灤縣，是旅居美國的重要中西文學理論學者、文學評論家，亦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比較文學系的籌建者，較為人熟知的文學評論，當是與金庸(1924-2018，本名查良鏞，武俠小說家)書信往來，對其所著《天龍八部》有「無人不冤，有情皆孽」的八字評語，金庸修改出版《天龍八部》時，乃將信件完整附於書後，除作為紀念外，亦可見肯定。陳世驥寄予楊牧



圖一：講座海報

的書信大抵可分為兩階段：一是自 1965 年 12 月 8 日至 1966 年 7 月 3 日間的 7 封信，另一為 1970 年 7 月 26 日至 1971 年 5 月 11 日計 9 件。前者迄於楊牧抵達加州柏克萊大學師從陳世驤先生攻讀比較文學博士；後者始於楊牧將離開柏克萊大學，改赴麻州大學任教，其中最後一封信更是陳世驤因心臟病驟然離世前十餘日所寫。這些書信中呈現陳世驤與楊牧師生間的情誼、研究交流，不僅洋溢著對楊牧的肯定、關懷與寄望，也透露出自己在學術研究上的孤寂與信念，以及其與徐復觀先生（1904-1982，思想家）的情誼。本場講座主講人鄭毓瑜講座教授以上述 16 封書信的時間軸為座標，延伸陳世驤與楊牧兩位先生的經歷、交會、傳承與啟發，以及彼此間的共同提問，亦藉由兩人交接往來的關係，構築出一種獨特的「時代」與其所生成之意義，說明「人文精神」的發現或創造。



圖二：(左起)人文沙龍計畫主持人陳國榮教授、與談人須文蔚教授、主講人鄭毓瑜教授、主持人蕭麗華教授、人文沙龍計畫共同主持人葉純純教授

## 二、時間根系：陳世驤與楊牧各自的生命境遇

鄭教授首先指出，楊牧與陳世驤的相遇相知，於各自的生命境遇裡出現了不一致的痕跡。1940 年楊牧生於日治時期的花蓮，隔年日軍偷襲珍珠港、中國正式對日本宣戰，臺灣也成為英、美諸國的敵對方。楊牧曾自述幼年因美軍轟炸而舉家疏散到瑞穗附近的小村落。陳世驤於 1941 年世界大戰期間，由中國赴美深造，1945 年起任教柏克萊大學東方語文學系，1948 年為北大五十周年校慶

發表了陸機〈文賦〉英譯，序文題名“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1951年發表英文論文“In Search of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從關鍵字（Key word）「詩」的字根「𠄎」（如足之行走進退），說明其基於如樂舞般節奏，暗示性地展現個人懷抱。陳世驥以此作為中國文學批評身心合一的情動根源，成為日後構築「中國抒情傳統」論述最為關鍵的基礎設定。1960年陳世驥發表“Multiplicity in Uniformity: Poetry a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1963年發表“Metaphor and the Conscious in Chinese Poetry under Communism”，乃是對1957年至1960年代初期共產中國「大躍進」（大煉鋼、人民公社等政策）所導致的飢荒與災難的感慨，其指出1958年新民歌運動中的詩作，完全為黨國服務，歌頌好戰鬥狠的共產主義，透露出作為海外學者對當時中國政局、文壇的雙重失望。

另一方面，在五〇年代後半，中學生的楊牧開始創作新詩，也實際體驗從世界大戰、冷戰到臺灣白色恐怖的肅殺沉悶的氛圍。1958年，高中畢業的楊牧暫居臺北，也參與當時諸多成名詩人的聚會。此時的楊牧開始思索生活處境中的各種聲音，除了自然界的風聲雨聲，也隱約體驗到當時臺灣知識分子的心聲，他稱為是一種「幾乎就要頹唐成形的悲情」。大學階段的楊牧進一步在古典漢語文學及西洋文學中涵養，體認混雜共生的歷史傳統。1962年5月其於東海大學英文系提交畢業論文*The Modern Agony as Shown in T. S. Eliot's Earlier Poems and Modern Chinese Poetry*，隔年翻譯論文首章〈艾略特的成就及國人對他的誤解〉發表於《民主評論》，文章提及艾略特（1888-1965）受美國詩人龐德（1885-1972）與意象主義、法國象徵主義的影響，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痛楚，形成其所謂「歷史意識」（the historical sense），並強調這不只是對於「過去性」的領悟，也是對於「現在」的領悟。1989年楊牧在《一首詩的完成》書中，另特立專章討論艾略特強調過去與現在並行相生的體悟：「一個自覺的現代詩人下筆的時候，必須領悟到詩經以降整個中國文學的存在；而在今天我們這個地緣環境裏，和順著這地緣環境所激盪出來的文化格調裏，我們也領悟到台灣四百年的血淚和笑靨——這正如同盎格魯·撒克遜的特殊格調，對艾略特的啟示乃是無所不在的。」從楊牧的敘述可知，其在多年後重新詮釋並轉化這樣的創作自覺，顯示其跨文化視野，並充分意識臺灣於地緣政治下的處境及文化特質。

### 三、共同的「人文」之路：兩人所關注跨國族的文化新銓

大學畢業後，楊牧赴美愛荷華大學獲藝術碩士學位。1965年12月，陳世驥有兩封信給楊牧，提到自己將在柏克萊大學的比較文學系與現代研究中心推進

### 1970年與陳世驥及師母於柏克萊



圖三：楊牧（右）與陳世驥（左）及師母於 1970 年合影（圖片來源：須文蔚教授提供）

中國與西洋文學的比較研究，以及貫通中國古代與現代人文研究，也推薦楊牧申請助教及獎學金。多年後楊牧回憶 1965 年 6 月與陳世驥的首次碰面就決定了「一生必要走的路」。陳世驥問楊牧在愛荷華畢業後想研究比較文學的什麼題目，楊牧說出自己對「史詩和悲劇」的看法，深獲陳世驥認同也邀請他來柏克萊繼續研究。事實上，史詩和悲劇在中國文學傳統裡不曾發展成型，是比較文學研究領域中重要的課題，為此陳世驥也進行了長達數十年的思索。1969 年陳世驥致信徐復觀，提到當時正為楊牧準備博士口試並進行模擬問答，信中強調中國古代文學中「敘事長詩」（認為不能將之稱為「史詩」）作為「文化產品」、「文化精神」，應該放置回文化形式所生成的建構原則，雖可以消極的看作中國文學的限制，但積極的看也可視為中國文學之固有精神：「與西洋文學對待，就形式論，可略說為美術文中抒情的傳統與敘事鋪張的傳統之對待。就精神言，可說是一面從人的，今世的觀點出發，一面是從神話或超人，從他世或超世出發。」

鄭教授進一步指出，陳世驥早在 1951 年論「詩」字字根的論文中即展現出這樣的概念。《詩經》抒情詩作為周代初期的「文化產物」(a product of the early Chou culture)，其所展示的手舞足蹈、歌頌吶喊，正是透過涵攝宗教儀式、語言、藝術等文化形式的構建原則，才成為跨主體間得以理解、認同並持續存在的關鍵記號。陳世驥從《詩經》抒情詩歸納的簡短 (brief)、神祕 (cryptic)、即興 (accidental) 而具暗示性 (suggestive) 的抒情形式特質，彷彿中國人表述上具有的一種「神奇公式」(magic formulae)，因此掌握「文化」符號形式而不只是「文體」分類，才是理解陳世驥提出「抒情傳統」的關鍵。1953 年陳世驥為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出版的「跨文化 (Interrelations of Cultures) 專輯」撰寫〈中國文學的文化要義〉也認為中國文學創作沒有史詩或悲劇英雄，原因之一是中國人罕見歌頌戰爭、血腥爭奪的作品，傳統所謂「中國」應理解為「一個文明的整體」(a whole body of civilization)，而非確切意義上作為政治實體的「國家或民族」，兩千年前的中國人早就意識到「國家是『不必要』之惡」(the state is an unnecessary evil)。何以陳世驥如此義正辭嚴地藉由「一個文明整體」來抵抗民族國家的權力擴張？當與 1949 年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有關，知識分子藉由重新討論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前途，一方面辨明傳統文化對於道德、人性的認知與體現，另一方面同樣關注文化發展與民主建國的關係。

與陳世驥、徐復觀關係親近的楊牧，也在這波思潮中關注跨國族的文化新銓。1970 年楊牧與林衡哲合編《新潮叢書》的弁言寫道：「對於上一代的某些人，所謂『新潮』曾經是『西潮』，曾經等於是驟然湧來的狂浪，拍打著東方古國的陸地；對於我們說來，『新潮』並不完全如此意味。這個時代的文化是彼此撞擊互相建設的文化。我們肯定新生的廣義的中國文明。」該批叢書第一本即劉述先 (1934-2016) 的《文化哲學的試探》，書中析論史賓格勒 (1880-1936)、卡西勒 (1874-1945) 兩家學說，其中卡西勒重新定義人是一種符號的動物，已經將符號 (symbol) 推向一種可以適應環境的無窮變化，可以指稱、描述而決定實在的文化意義系統；正是符號與人類精神活動相應相生，物質不是死的，覺知不是被動的，一個觀念詞就是一個符號形式渾圓具體的創生，如同最古老的字根，正在打開一個嶄新的世界。這些說法也與陳世驥、徐復觀由文化產物、關鍵詞入手的研究方法與展望互為參照。事實上，陳世驥 1960 年代的相關著作也呈現了一種時代危機感，對於中國文學、文化不斷重構的實踐，如 1967 年宣讀的〈原興：兼論中國文學特質〉，認為「興」作為傳統「詩」藝的初始類型，其實是因為反省二十世紀初民歌徵集運動。大躍進時期毛澤東 (1893-1976) 領導的社會主義群眾大量採風民歌，利用歌舞來組織、動員群眾並灌輸意識型態，數百萬民歌並非個人的寫作，而是幹部勸誘下合作生產的結果，為如今更巨大、危險的黨國野心服務。鄭教授指出，文學藝術本質何在，才是陳世驥探求詩歌原始類型的真正憂慮。1970 年楊牧將〈原興〉中譯刊載於《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同年 10 月 5 日陳世驥來信與楊牧討論其博士論文初稿，認為透過《詩經》「公式語」(套語) 的分析，可以推測口傳文學的時代也仍具有創造力，亦即在套語重複或改動中，實則已經出現超越群眾歡舞而產生個人的獨創性 (individual ingenuity)。

鄭教授表示，獨創而超越了群眾歡舞，對於楊牧的啟發即是要讓詩歌在其語言與文化脈絡中顯示自己，其中最重要者就是以「技術作為發現」(technique as discovery)的關鍵。「技術」是作者或評論者「發現、探索、發展他的主題，並傳達意義且最終做出評價」的唯一方法；這樣的「技術」早已超越文本內的修辭技巧，而是必須在文本建構（或重構）的過程，同步自覺且自省創作（評論）行動的意義與價值，最為代表者當為其 1982 年創作的〈周文史詩〉(The Weniad)。楊牧站在反戰、厭戰的當代價值視域，重新檢視《詩經》之〈生民〉、〈公劉〉、〈緜〉至於〈皇矣〉、〈大明〉等五篇長篇敘事詩組，深入融合人物、行為、事蹟、隱喻等面向，重新建構周初諸王的建國路徑，表現對於征戰殺伐的克制與謹慎，乃是一種「兵者為凶器」的體悟，也是長久對於戰爭的反感與無奈。

#### 四、超時空的意義：連綿相遇的歷史責任所構築的「同一時代」

最後，鄭教授引述杜維明於〈智識份子與時代訊息〉一文的看法，其認為「知識分子必須同時對歷史傳統與新時代負責，對於每一個新時代的詮釋都關聯著整個歷史文化的傳承，就象徵意義來說，比如能超越時代限制的孟子和孔子，才是同一個時代的人物。」楊牧與陳世驥各別對自己所處的時空環境提出回應，由思想、文學與文化史等議題進行重構，陳世驥提出「抒情」如何成為連結古今的傳統，楊牧則進一步在創作中揭示文本敘事隱含的倫理關係，並藉由「獨創性」使文學能跨越民族、國家、時間，以共感的文化格調開啟時代新潮。兩人的交會同時也承擔了綿延相續的歷史責任，這前後並存的時間感早已超越了線性階段的侷限，而創造了相知相得的「同一時代」。